

老街有一户白家,白家有四个女儿,街坊们记不住她们的名字,便叫她们大白、二白、三白和四白。

这不仅因为她们姓白,更因为四姐妹的皮肤实在太白,大太阳下地里一走,白得照眼。可以说,老街上,没有谁能比白家四姐妹长得白净。四白和我一个小学,同年级,不同班,我和她不熟,偷偷地看过她,确实白,白如凝雪——这是我读中学后学的一个词儿。据说四白悄悄地喜欢上了我们班上的小宁,考中学,小宁和我考入的都是男校,四白考进的是一所女校。我曾经问过小宁,有没有这回事?小宁只是笑笑,不置可否。

小宁和四白要好的事情,在老街上传开。传开的原因,是四白的爹妈不愿意四白和小宁搭拉,嫌小宁家是摇煤球的,黑不溜秋的,跟黑地梨儿似的,哪里配得上白得像玉的四姑娘?其实,宁家是开煤铺的,不是摇煤球的。煤铺离老街很近,街坊们几乎没有没去过宁家煤铺买煤球或蜂窝煤的。人家宁家的人,虽然没有白家的人白,但也不至于黑不溜秋。白家爸爸以前在布巷子里一家绸布店当伙计,看不上宁家,主要是嫌煤铺掌柜的成分高。在讲究出身的年代里,这样的出身,确实是洗不掉的黑污点。

有这样一件事,在老街上当成笑话传开。说读高中的一年夏天里,小宁给白家送了一筐白薯,是他父亲回乡下老家,刚从麦茬儿地里刨出来的新白薯,让白家尝尝鲜。以往,老北京人爱用这麦茬儿薯焐着吃,锅底能焐出一层糖稀一样的糖嘎巴,特别好吃。从这筐麦茬儿薯可以看出,宁家挺中意四白。谁知小宁走后,白家爸爸就把这一筐白薯倒垃圾似的倒掉了。白家妈妈问:“挺好的白薯,你怎么说扔就扔了呢?”白家爸爸撇撇嘴说:“你没看见那是什么筐吗?”白家妈妈明白了,是过去煤铺里装煤球用的藤条元宝筐,早就不用了。街坊们也就明白了,白家还是嫌弃宁家。

听说白家明确无误地告诉四白,不让她和小宁牵连。三个姐姐也都来了,纷纷劝四白,爹妈的那一套玩意儿,不厌其烦又唠叨一遍。四白哪儿听得进去呀,明里暗里依然和小宁来往不断,有一次两人一起在北海划船,还被街坊撞见了

小时候,我看到农村河边的一棵石榴树上开了好多红花,再结了几个小小的果子。我仿佛都闻到石榴果的甜香了。某一天,我突然发现,那几个果子长到拇指大,好像不长了。我摘下一个石榴果,剥开,里面还是白白的嫩嫩的小果粒,我吃了几粒,又苦又涩。有大人说,这是用来观赏的花石榴,真正可以吃的果石榴,又大又好吃。

第一次实现吃石榴的自由,是一个同事带给我的。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。有天他突然送我一箱的石榴,我不好意思收。同事笑说,“你真不用客气,我是云南人,这是我老家的特产石榴,我们那里漫山遍野都是。”这仿佛一下子就给了我一个画面,漫山遍野种满了石榴树,石榴树上又长满了一个个硕大的石榴果。在同事的坚持下,我最后还是收下了。回家打开箱子,里面是十个又大又红的石榴。我剥开其中一个,果粒又大又红还饱满,一看就让人心生喜欢。我忍不住抓上几粒往嘴里塞,马上整个嘴里都充盈着清甜的爽意……我因此连着吃了半个月的石榴,大大朵颐又回味无穷。

有天晚饭后,我路过一家水果店,门口摆放的一排石榴火红火红的,看

老街黑与白

肖复兴

再打吗?

我们高中毕业那年,赶上上山下乡。小宁去北大荒,四白去陕西,两个人不是去一个地方,一个大东北,一个大西北,离着这么老远,时间一长,再结实的一根线绳,这么抻着,不断也得断。白家的爹妈未卜先知一般,把心放进肚子里了。去北大荒的先走,四白去火车站送行。起初,白家爸爸不让她去,白家妈妈说:“你不让去,她就不去了?她的腿长你身上了?跟老四说好,反正是最后一次,好说好散,咱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。”白家爹妈心肠一软,大意失荆州,四白到火车站这一送,直接送到了北大荒。四白上了火车,再没下来,怕查票的给她赶下车,她一直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,都是小宁和同学送吃的喝的,一夜两天,来到了北大荒,感动了北大荒接站的人,破例把四白留下,和小宁分到一个生产队。两年之后,四白和小宁,双双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。到家前,四白的三个姐姐,来劝一直生闷气的爹妈,木已成舟,就顺水推舟吧。白家爹妈没再说什么,但心里为四白隐隐担忧。白家妈妈对白家爸爸说:“就知道一条道走到黑,不撞南墙不回头!”白家爸爸只说了一句:“等撞了南墙,黄花菜都凉了!”

流年似水。一晃,五十多年过去了。四白和小宁如愿以偿,花好月圆,先后有了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长得都随四白,皮肤白得让人羡慕。1974年,北京来人到北大荒,招收老三届的高中生回京当老师,四白、小宁和我先后脚回到北京。他们的两个孩子,都是回北京以后出生的,白宁两家分别帮忙带过孩子。过去的事情,水过地皮湿,只流传在老街的传说里了。

二十多年前,老街拆迁,宁家的煤铺属于私产,分得的拆迁款,多得让白家爹妈咋舌。小宁拿着钱,早早地在三环买了一套楼房,更让白家爹妈说不出话来,心里忍不住想,“真是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人家老四一条道走到黑,没撞着南墙,倒撞出一套楼房!这世道和命运,谁也摸不清,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。

呢。“儿大不由娘!”街坊们这样说。白家爹妈很是生气,又没招儿,吵过,闹过,这么大的姑娘,还能



风起

齐铁偕 诗书画

海不扬波,涟漪条条,
暑气渐渐消失在水面。
升起的帆,急于满挂,
但等飒飒秋风天上来。

2002年9月,从成都来沪探亲的李致想去看看嘉兴李氏祖籍地,得到李济生、李小林、李国燦的响应。他们先参观了嘉兴图书馆新馆。嘉兴图书馆老馆建于1904年,与巴老“同庚”,嘉兴市文联主席朱益民说,嘉兴想把图书馆改名为“巴金图书馆”,巴老没同意。

李氏祖籍地在用里街上,现成市区主干道了。朱益民说,清初,太平军进攻浙江,李家祖屋毁于战火。这时,我见不远处有座供市民小憩的凉亭。走近看,发现此亭是在旧城改造时建的。出自对巴老的敬仰,取其字“芾甘”中的“甘”。如今,“仰甘亭”已成网红打卡地了。

看了亭碑简介,使我对李氏祖上的发展,变迁有了个大致了解。从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起,李氏家族便分两支。一支为李介庵(名文熙),即巴金的高祖,离开嘉兴前往四川任职,后定居成都。曾祖父李璠把嘉兴到四川的迁移的经过记

观航天员祝福祖国感

邓伟志

英雄太空探,
新知高如山。
飞天贺祖国,
余音绕天转。

录于《先府君行略》。如此推算,巴金是迁蜀后的第五代。另一支李姓家族仍留在嘉兴……

乡愁

陆正伟

清同治年间,在嘉兴塘汇镇镇西建了李家祠堂,成了嘉兴和成都两地李氏后人祭祖之地。1923年4月,巴金与三哥李尧林出川到上海求学,堂二伯李青城与大哥李尧枚托他俩抽空去看看李家祠堂。到上海后,哥俩由亲戚陪伴来到嘉兴。翌日,坐着乌篷船去祭扫,看到的却是残垣断壁的败落景象。返沪后,哥俩把所见惨状写信给成都老家。不久,李青城汇寄80块大洋到嘉兴请族人修葺祠堂。翌年初,他俩趁南洋中学放假,到嘉兴二谒祠堂,经修缮,有了明显的改观。当我们一行来到塘汇镇镇西时,街坊们见李氏后人来寻访祠堂,便告之四十多年前,因无人打理而坍塌了,所幸码头上的花岗岩石阶及泊船的铁桩仍在,那口枯井突兀在岸边……

李济生对嘉兴南湖上的烟雨楼情有独钟。大伙随他登楼观景。李济生讲起成都老家有一道叫“烟雨楼”的思乡菜,除夕晚上饭桌上必不可少。吃年夜饭,这菜不能动。只许用筷子在“红烧蹄髈”上戳戳。长辈会对晚辈说,这是家乡的“烟雨楼”。这菜

某日整理书柜,翻出一张泛黄的上海电影节排片表。年轻时心气足,每至电影节,早早就买好排片表,列出最有效率的时间表和最佳路线,然后就按图索骥一头扎进了光影世界。巅峰状态是揣着面包和矿泉水一天看五部电影,转战四个城区。记得看《天使爱美丽》的那一天,摸黑走进电影院时已开场,票子还带着黄牛手上的余温。错过了片头,但恰好看到银幕上白色餐桌上的玻璃杯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。整个城市美好的奇迹都被艾美丽的双手点燃了。艾美丽大得惊人的眼睛和慧黠的笑容,在大银幕上如同神迹。陈可辛的《甜蜜蜜》也是在那年的电影节看的。黄昏,从一家电影院匆匆赶往另一家,一时迷失了方向,在路上拦住一个人问路。没想到在下一个街角,一辆车子从我们身边缓缓经过,停了下来。车主把头伸出窗外:“来,我刚好顺路,送你们过去。”原来是十分钟前为我们指路的人。得知我们要看的是《甜蜜蜜》,临下车时,他微笑着说:“快去吧,是很值得看的片子。”陌生人的善意和影片怀旧怅惘的情调,给那个夜晚涂上温柔的色彩。沉浸在电影余韵中的两个人,剧终后在影城门口的花坛边默默地坐了许多。

在网上看片子,没有路上的辗转与期待,归途中光影世界与现实的落差、心情的激荡和平复,其实已经不能算看电影,因为它们并无日后辨识的特殊印记,苍白得只余内容。就像只懂吞咽桌上大餐的食客,即使像阅读情书一样看菜谱,也体会不到食材本身的气息和美感。真正会吃的人,懂得在菜场细心挑选,耐心地清洗、分割、腌制,然后气定神闲地调节火候,最终成就既饱口腹又满足心灵的一餐。享受过程是美食的奥义。日本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独自寻觅食材、烹煮,连餐具都自己烧制。他说,满足于家人做的饭菜或厨师按菜谱做的菜,是草草打发自己的饮食生活,可谓“对饮食世界一无所知”。

近几年入手的美食书,往往偏向厨房外的话题。最近在看《菜市场里的大厨》:遭遇事业瓶颈的年轻大厨清晨来到菜场,卖鱼的大叔让他帮忙收拾一条地上的大鱼。饭店里的鱼向来都是一批批杀好、内脏挖净送进来的。于是他有点困惑,下意识地在视线范围内搜寻杀鱼的不锈钢台面。大叔见他一脸呆滞,挖苦了他两句,随后用脚抵住鱼的大头,用去鳞器“啪沙啪沙”刮去拇指大的鱼鳞,接着从塑料桶里掏出一把手臂长的刀砍去鱼头。“手法之利落,让我忍不住屏住呼吸,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”大叔把大刀塞在他手里让他切片,结果切到鱼的中骨,因为错误的用力方式,他只勉强切下一片被压得支离破碎的鱼肉。大叔连声嘟囔可惜,取过刀去,几下就切出一堆紧实、闪着光泽的鱼片。鲜鱼带着海藻味的气息、菜场路面水花的腥气,大叔和顾客的笑骂,给学院派的大厨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早课。有了私人的情绪、记忆和印记,生命才有鲜活的佐证和独特的滋味。

要过了年初五才能吃。李致接着说,四川出产上等白酒。李家祭祖,不用白酒,却用浙江黄酒,意为不忘祖先,记住乡愁……

巴老家原籍是浙江嘉兴。我是在《随想录》中《西湖》的注解中看到的。在我眼里,巴老对浙江的山山水水有种特殊的感情。1987年夏,嘉兴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并波及杭州,损失惨重。正在杭州养病的巴老心急如焚,他

让小林拿钱请汪庄的副总以“旅馆客人”的名义捐给灾区。翌年,他还托我和警卫员顾正兵去浙江省民政厅捐款。浙江省的领导多次向巴老表示感谢,我总听巴老说:“我的祖籍在嘉兴。”



石榴的快乐

崔立

着新鲜又诱人。我买了两个。回家后剥开其中一个,尝着又大又红的果粒,不由得想起了朋友那年送我的石榴,拨了他的电话。多年前,因为工作变动,我和同事先后奔赴不同的新单位。我们还时不时地联系着,见面的机会却不多,就像我认识的许多人,虽然同在上海,却是几年,甚至几十年没再见面。

上一面。朋友,是应该经常见面的。电话通了,我说,“这周周末方便吗?聚聚。”我说了个地方。同事笑着说,“没问题,不见不散。”电话挂了,我继续往嘴里塞石榴果粒,汁水甜滋滋的。我也笑咪咪的。刚好走过的老婆大人看到了,问,“碰到什么好事了,这么开心?”我轻轻地嚼咽了把石榴果粒,感受它们在牙齿的碰撞下释放出的丰沛汁水,笑着说,“石榴的快乐,你不懂。”

佳节又重阳,玉枕纱厨,半夜凉初透。——李清照《醉花阴》在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中,重阳节飘着秋菊的清香,点缀着茱萸的枝叶和花果,洋溢着人们的欢欣、期盼与思念……然而,这充满诗意和温情的节日,其源头却透露着华夏远古先民对无妄的灾祸与邪祟的深深畏惧。从阴历的“凶日”,到欢乐的“良辰佳节”,九九重阳的华丽转身,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记忆,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重阳文化。

“重阳”一词,本义指“天”。古人认为“积阳为天,天上九重,故曰重阳”(宋·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)。它的引申义则是一种疾病,典型症状是周身发热、脉象过于旺盛,上古医学著作《黄帝内经》和司马迁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,对此都有

详细描述。直到南朝梁代,诗人庾肩吾《献寿重阳诗》(《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》)一语,才首次将“重阳”与九月九日这个特定日子联结起来。因为古人以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为阳数,九为阳数之极。九月九日恰是两个阳数相重,故称“重阳”。但极阳并非吉兆,在物极必反的观念里,阳极必变,盛极则衰,过盛的阳气反而会引动阴邪,九月恰逢秋寒乍起、草木凋零,更添了几分肃杀之气,因此这一天被视为“凶日”,避灾驱邪便成为九九重阳日最初的核心诉求,相关仪式及其必要性,生动地保存在一个幸运与恐怖交织的传说故事中。故事讲述某年九月九日,桓景一家在费长房的指导下,凭借佩戴茱萸、登山饮菊花酒,逃脱了灾祸,而留在家中的牲

畜则全部暴死。

费长房是一位被高度神化的历史人物,见于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。由此可知,故事设置

菊花香里开新酿

崔铭

的背景是东汉,正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重阳节形成期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说:“九月九日可采菊花。”《后汉书》中亦有“(汉献帝)兴平二年秋,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”的记载。更早的记载见于《西京杂记》,这是一部杂抄西汉故实和逸闻轶事的书籍。书中记述汉高祖刘邦宠妃戚夫人的宫中生活,每逢九月九日,便会佩戴茱萸,食蓬饵(以蓬蒿制作的饼),饮菊花酒。无论是传说故事,

还是正史、杂记都表明,从汉代开始,面对未知的灾祸,人们不再被动畏惧,已经找到了应对方法。而茱萸、菊花酒以及秋日登高所蕴含的中医药原理解,也表明人们已经发现,“凶日”并不神秘莫测,而是天气、物候周期性转换带来的影响。

如此简单、日常化的驱邪仪式,迅速推动了重阳日的娱乐化和节庆化。于是,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,直至今天,九九重阳,被文人骚客赋予风雅诗意,被普通百姓添加倍世欢愉,人们不再将它视为“凶日”,而是“俗嘉其名,以为宜于长久”(曹丕《与钟繇九日送菊书》),逐渐注入尊老、敬老、爱老的全新内核;登高也不再是仓皇避灾,而是吟赏秋景,即目抒怀,并进一步发展为有益身

心的社交活动;茱萸退去了巫术的迷雾,成为节日的装饰与情感的载体;菊花酒也不再是祛邪的灵药,而是亲朋欢聚时助兴的甘露,随之又衍生出赏菊这一既充满雅趣且喜闻乐见的审美文化活动;此外,还有点缀着大枣、栗子、松仁、银杏等时鲜秋果的重阳糕,在相互的馈赠中传递丰收的喜悦……

那个令上古人畏惧的“凶日”,就这样从灾厄与禁忌的束缚中挣脱,如同清寒苦涩的秋菊,被一代代中国人用真挚的情感与生活的智慧,重新酿造,最终凝成了今日这一杯充满生命礼赞的醇美佳酿。

重阳登高的意义,是为了在历史的对话中,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十日谈

重阳久久

责编:郭影